

朱婷婷, 谭 涛. 村两委负责人社会资本差异对农村发展水平的影响——基于江苏省 262 个村庄的实证分析[J]. 江苏农业科学, 2017, 45(7): 308–311.

doi:10.15889/j.issn.1002-1302.2017.07.080

# 村两委负责人社会资本差异对农村发展水平的影响 ——基于江苏省 262 个村庄的实证分析

朱婷婷, 谭 涛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5)

**摘要:**目前,我国乡村建设进入关键时期,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作为乡村建设的带头人,在促进农村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运用 2015 年江苏省南通市、盐城市及淮安市 3 个地区 262 个村庄的调研数据,实证分析村两委负责人的宗族基础、经济基础及关系网络等社会资本对农村发展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村支书同时任村委会其他委员或村主任任村党支部非村支书的其他职位对村庄的发展水平均存在显著性影响;村主任为当地大姓对村庄发展水平有显著影响,而村支书为当地大姓对村庄发展水平没有显著影响;村支书和村主任的经济基础和关系网络对村庄发展水平也存在相关影响。本研究对科学全面地选举村两委负责人、管理和规范村干部行为、推动农村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村两委负责人;农村发展;社会资本;多元回归模型

**中图分类号:** F325.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1302(2017)07-0308-04

在村民自治的背景下,农村发展自主性不断加强,农户间联系愈加复杂,以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为代表的村庄政治精英拥有村庄政治运作的权力,其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结构性资源深深嵌入到农村社会有机体中,村两委负责人之间存在工作经历、经济基础、大姓宗族背景等差异,使得社会资本积累不同的村两委负责人对村庄发展水平有不同的影响。国内关于村干部个体差异与村庄发展关系的研究较少,大多文献是研究村干部特征等对村干部行为选择的影响<sup>[1-2]</sup>;或探讨村干部的胜任力对工作绩效的影响<sup>[3]</sup>。实际上,由于个体特征难以度量,并没有通过建模方式将其和农村发展联系起来加以探讨,这也使本研究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因此,本研究试图将村两委负责人社会资本加以量化(本研究所指村两委负责人主要是指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引入社会资本特征构建经济学模型,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以往大多以个案经验为基础的局限,采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更为科学有效地分析村两委负责人社会资本差异对当地发展水平的影响,从而逐步探讨并提出相关建议,这对于丰富相关制度和政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 1 研究综述和分析框架

村两委负责人是村民致富的领路人,他们在农村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中起重要作用。目前,国内关于村干部个体差异与村庄发展关系的研究较少,部分学者研究发现,除了客

观原因及国家政策影响,村干部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在村庄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国外,众多学者认为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sup>[4-6]</sup>。结合中国国情,本研究村两委负责人的社会资本不同于企业职工或者其他主体的社会资本,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行政村作为半熟人社会,村庄管理方面更容易受到地缘、宗族、姻亲等支持者的分化组合而发生变化。众多学者研究认为,宗族大姓的存在对村庄发展有着积极作用<sup>[7-11]</sup>;此外部分研究认为,拥有丰富经济资本或政治关系网络的村干部将逐渐成为农村社会的普遍趋势<sup>[12-17]</sup>。无论是农村政治建设,还是农村经济发展,以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领路人,村两委负责人都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在此理论逻辑之下,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说:村两委负责人的经济基础越丰富,该村社会发展水平越高;村两委负责人的政缘关系网络越丰富,该村社会发展水平越高。

## 2 数据来源和模型设定

###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 2015 年在江苏省南通市、盐城市及淮安市 3 地的抽样调查,选择工业和农业发展并重,且经济发展程度差异较小的 21 个乡镇,将这 21 个乡镇的行政村作为样本,最终确定调查 300 个村。因此,本调研总共发放问卷 300 份,剔除数据缺失、异常、有误的问卷,最后得到有效问卷 262 份。此外,为更为深入地了解详细资料,本次调研还在基层政府提供的村庄名单中选取 10 名村干部进行深度访谈。

### 2.2 模型设定

本研究在设计测量农村发展水平指标的时候,采用李克特量表法概括出该村经济、政治、文化、医疗、环境等基础设施建设指标,通过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得,  $KMO = 0.718$ , 即  $0.7 < KMO < 0.8$ , 基本可以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指标权重,最终得到各个村庄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此外,使用普通最

收稿日期:2016-11-14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编号:SK2014002)。

作者简介:朱婷婷(1990—),女,江苏如皋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村人力资源。E-mail:zhutingfighting@163.com。

通信作者:谭 涛,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农业政策、农村发展与农村社会保障。E-mail:tt@njau.edu.cn。

小二乘法(OLS)构建多元回归模型,以农村社区发展水平为因变量,以村委会主任或村支部书记的社会资本特征为自变量,并控制村庄自然禀赋特征,建立回归模型。现将基本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y = \beta_0 + \beta_1 x_1 + \beta_2 x_2 + \beta_3 x_3 + \varepsilon。$$
 (1)

式中:y 表示 2015 年村庄社会发展水平;x<sub>1</sub> 表示村委会主任或村支部书记的基本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x<sub>2</sub> 表示二者的社会资本特征,包括是否是当地大姓、村主任和村支书是否为同一人、是否在村两委同时任职(村支书任职村委会其他委员或者村委会主任任村党支部非村支书的其他职位)、是否有企业工作经验、是否经营副业、是否有家族企业、是否有亲戚在镇政府或者更高层政府机关工作、经济状况;x<sub>3</sub> 表示影响村庄发展的自然禀赋特征;β<sub>0</sub> 为常数项;β<sub>1</sub>、β<sub>2</sub>、β<sub>3</sub> 是各待估参数;ε 为随机扰动项。

2.3 样本描述性分析

将调研数据整理后,各个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群体)

变量类型	变量	变量解释	村主任特征		村支书特征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村庄社会发展水平	2015 年村庄经济、政治、文化、基础设施等综合水平	2.729	0.815	2.729	0.815
自变量	性别	0 = 男,1 = 女	0.031	0.172	0.046	0.209
	年龄	村干部年龄(岁)	45.794	7.603	45.328	7.256
	受教育程度	1 = 小学及以下,2 = 初中及中专,3 = 高中及大专,4 = 本科及以上	3.015	0.706	3.080	0.709
	是否是当地大姓	0 = 否,1 = 是	0.733	0.443	0.679	0.468
	村主任和村支书是否为同一人	0 = 否,1 = 是	0.477	0.500	0.477	0.500
	是否在村两委同时任职	0 = 否,1 = 是	0.832	0.375	0.679	0.468
	是否有企业工作经验	0 = 否,1 = 是	0.672	0.470	0.439	0.497
	是否经营副业	0 = 否,1 = 是	0.668	0.472	0.523	0.500
	是否有家族企业	0 = 否,1 = 是	0.462	0.499	0.309	0.463
	是否有亲戚在镇政府或者更高层政府机关工作	0 = 否,1 = 是	0.260	0.439	0.225	0.419
控制变量	家庭经济状况在本村的位置	1 = 偏下,2 = 中等,3 = 偏上,4 = 本村最富裕之一	2.637	0.702	2.511	0.731
	村委会到乡镇府距离	村委会到该乡政府距离(里)	8.718	4.486	8.718	4.486
	是否有国家某政策或项目的支持	0 = 否,1 = 是	0.405	0.492	0.405	0.492
	人数	2015 年末常住人口数量(人)	3 058.076	1 119.153	3 058.076	1 119.153
	人均耕地面积	2015 年人均耕地面积数(亩)	1.214	0.608	1.214	0.608
	人均收入	2015 年人均收入(元/年)	10 466.68	3 789.071	10 466.68	3 789.071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首先,在数据处理时进行稳健性检验,稳健的回归估计量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异方差问题。再者,在进行数据处理时,将控制变量逐个加入模型进行检验,且不影响模型解释变量的经济意义,并且 2 个模型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 10,证明 2 个模型均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此外,从最终运行的结果来看,2 个模型拟合优度分别为 0.917 1 和 0.865 6,这表明 2 组样本回归方程较好地拟合了样本观测值。村干部的社会资本直接反映了其在村庄中的地位和资源获取状况,而且还深刻影响其社交行为。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人不仅是理性的,而且是讲究对等互惠的”,尤其是在社交范围较狭小的农村,互惠交换的原则直接影响村干部资源运用的行为选

择,影响到村级发展需求。模型结果如表 2 所示。

3.1 村支书兼任村主任或村支书兼任村委会其他副职对村庄发展水平的影响

通过实证分析显示,当村支书同时任村主任时,每增加 1 个单位,其社会发展水平将会下降 0.419 个单位,且在 1% 水平上显著,这也就是说如果村主任和村支书为同一个人,对村庄的发展水平并没有起到积极作用,甚至会阻碍村庄发展。这一点不难解释,由于村支书和村主任为同一人,可能会导致权力集中,并且监督和约束也难以完善,不利于村庄的组织和管理。此外,通过验证可知,村委会主任任村党支部非村支书的其他职位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会对村庄的发展水平起到积极影响,同时村支部书记任职村委会其他委员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会对村庄的发展水平起积极影响。从理论上讲,

表 2 村两委负责人个体差异对村庄发展水平影响的多元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村主任		村支书	
	系数	稳健标准差	系数	稳健标准差
村委会到乡镇府距离	-0.021 ***	0.006	-0.028 ***	0.006
是否有国家某政策或项目的支持	0.067 *	0.035	0.051	0.043
人数的对数	-0.045	0.033	-0.046	0.042
人均耕地面积	-0.041	0.027	-0.039	0.037
人均收入对数	0.219 ***	0.054	0.292 ***	0.068
村主任和村支书是否为同一人	0.010	0.037	-0.419 ***	0.069
性别	0.111 6	0.123	0.049	0.082
年龄	-0.002	0.003	-0.001	0.004
文化程度:初中及中专	-0.144	0.142	-0.115	0.119
文化程度:高中及大专	-0.041	0.142	-0.009	0.117
文化程度:本科及本科以上	0.044	0.152	0.091	0.122
是否是当地大姓	0.119 ***	0.046	0.059	0.054
是否在村两委同时任职	0.131 **	0.062	0.296 ***	0.078
是否有企业工作经验	0.026	0.045	0.100 *	0.057
是否经营副业	0.126 ***	0.045	0.085	0.052
是否有家族企业	0.008	0.032	0.064	0.046
是否有亲戚在镇政府或者更高层政府机关工作	0.068	0.043	0.146 **	0.061
家庭经济状况在本村的位置:中等	0.101	0.088	0.087	0.125
家庭经济状况在本村的位置:偏上	0.201 **	0.096	0.054	0.127
家庭经济水平在本村的位置:最富裕家庭之一	0.362 ***	0.127	0.449 ***	0.160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水平上影响显著。

“两委会合一”有利于以村支书为代表的“村支部委员会”和以村主任为代表的“村民自治委员会”之间更好地协调,决策效率得到提升,利于村庄的管理与发展。本研究从实证角度对有关“两委会合一”的学术争论进行了全新的阐释,村支部书记兼任村委会除村主任外其他委员的职务是一种最优兼职模式,其结论对于如何恰当处理农村“两委”关系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3.2 村支书和村主任为当地大姓对村庄发展水平的影响分析

从表 2 可知,村主任为当地大姓,在 1% 的水平上对农村发展水平起显著的积极作用。一般而言,由于存在更多的共同利益,来自大族大房的村干部有更强的话语权,能够更好地整合乡村资源。然而,如果这一资本被不当运用也存在严重的弊端,所以需要完善的规制和监督。相比于村主任为当地大姓对村庄发展水平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村支书为当地大姓的系数为 0.059,但没有显著影响,这样的差异也是可以理解的。村主任是由村民选举产生,如果是当地大姓,管理能力较强、威望较高或经济基础较丰富的优秀领导者会得到较多支持,他们更能够因地制宜地做好基层工作,对村庄发展方面有一定的积极影响。然而,村支书来源于村党支部全体党员直接选举,由镇党委任命,这一自上而下的任命方式不同于自下而上的村民选举方式,因此村支书为当地大姓的影响力不大是可以从制度层面来解释的。

3.3 村支书和村主任的社会经济资本对村庄发展水平的影响分析

将村主任或村支书“经营副业”或“有企业工作经验”或“有家族企业”作为其拥有的社会经济资本的衡量指标。由表 2 显示,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有企业工作经验”或“经营副业”或“有家族企业”,都对村庄发展水平有正向影响作用,但各自显著性不一样。具体而言,村主任经营副业每增加 1

个单位,其对该村社会发展水平的影响将会增加 0.126 个单位且在 1% 水平上显著;此外,村支部书记有企业工作经验每增加 1 个单位,其对村庄发展水平的影响将会增加 0.1 个单位且在 10% 水平上显著。事实上,无论是“富人从政”还是“干部谋富”的现象,规模都在不断扩增中。随着村庄经济精英走上村干部岗位,大多会积极行动,通过利用现有资源,凝聚内部力量,吸引外部资金投入到了村集体的发展中,最后促进本村的全面发展,这也和很多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

3.4 村支书和村主任的政缘关系网络对村庄发展水平的影响分析

通过“是否有亲戚在镇政府或者更高层政府机关工作”来表示村两委负责人的政缘关系网络。从表 2 回归分析结果可见,村委会主任或者村支部书记有亲戚在镇政府或者更高层政府机关工作都将对该村的发展水平有积极影响,尤其是当村支部书记有亲戚在镇政府或者更高层政府机关工作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会对村庄的发展水平起积极影响。村支部书记是由村支部党员选举产生且由上级党委任命,通过与乡镇领导的接触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和业缘关系,利于掌握更多的信息资源,改善村庄经济发展的条件。此外,政府有限的扶持资金面对众多的乡村需求显得十分不足,村书记与乡镇干部或高层级政府干部的关系亲疏直接影响其村庄争取扶贫款和支农贷款的量和可能性。当然不排除有的村干部利用支持资金谋取私利的可能,这须要进一步加强监督与规范。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两委负责人的社会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所在村庄的发展状况。这一研究有助于更好地推动村干部人才队伍的建设,从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推动村庄的发展。基于分析,提出如下建议:(1)鼓励村两委班长交叉

任职的基础上避免“一肩挑”。鼓励两委负责人交叉任职,可以加强 2 个部门之间的联系,使“两委”的工作开展起来更为顺利。同时也认识到,要掌握好适度原则,避免实行“一肩挑”的模式,防止阻碍基层民主自治的进程,促进农村社会全面有效发展。总之,为避免这种“一肩挑”模式,又要避免“两委”之间的矛盾对农村发展的不利影响,村支书任职村委会其他委员或者村委会主任任村党支部非村支书的其他职位的举措将成为一大重要探索。(2)发挥村两委领导班子自身社会资本的对村庄发展的正导向作用。研究表明,两委负责人的社会资本存量较多,且不同程度上影响村庄的发展。因此,要注重选拔一些有社会资本且愿意为民办事的负责人,他们有足够的精力和能力来从事村庄管理与发展。对于本辖区内的当地大姓者、私营企业主、有家族企业或家庭经济水平较高的村民,乡镇党委应多方位考察,尽量吸收进村委班子来发展为新一代接班人,还可以在在政策上鼓励其扎根农村,为农村的全面发展作贡献。当然,还须注重村干部队伍的规范化管理,加强村干部作风建设,搞好绩效考核管理,在引领村庄发展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 参考文献:

- [1]刁晓君,裴志军,周 璇. 村干部的非农工作经历与其工作绩效——基于两省六市的实证分析[J].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2(6):471-476.
- [2]杨 威,余秀江,何 旺. 村干部人力资本对其工作绩效的影响研究[J]. 南方农村,2012,28(10):72-78.
- [3]余秀江,何 旺,杨志锐. 村干部社会资本对其工作绩效的影响研究[J]. 广东农业科学,2011,38(20):204-208.

(上接第 286 页)

的比较可知,东坑集水区产生的面源污染量远小于城源集水区,其溶解态面源污染总磷含量减少 14 kg/km<sup>2</sup>,总氮含量减少 562 kg/km<sup>2</sup>,氨氮含量减少 257 kg/km<sup>2</sup>,减少幅度分别为 40%、81%、82%。综上分析,说明东坑集水区采取的现代坡地水土保持生态果园开发模式可以防控吸附态面源污染,对溶解态面源污染中总磷的拦截率为 40%、总氮的拦截率超过 80%,效果显著。

#### 4 结语

赣南地区是典型的南方水土流失易发丘陵山区,20 世纪 70—80 年代水土流失非常严重,成为南方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经过以小流域为单元的水土综合治理和生态建设,赣南地区有效地改善了生态环境,提高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赣南对红壤小流域的综合治理做到治理、开发、保护相结合,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相统一,工程、生物、耕作措施并举,把小流域建设成为生态和谐、水土资源得到合理利用、各业协调发展的自然生态体系,其水土治理模式可以在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防治中大力推广。

#### 参考文献:

- [1]赵其国,黄国勤,马艳芹. 中国南方红壤生态系统面临的问题及

- [4]皮埃尔·布迪厄. 实践感[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83.
- [5]科尔曼. 社会理论的基础(上)[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354.
- [6]林 南. 社会资本:争鸣的范式和实证的检验[J]. 香港社会学学报,2001(2):38.
- [7]肖唐镖. 村民选举“宗族势力干扰论可以休矣[J]. 政治,2011(3):31-33.
- [8]公培超. 影响村民选举的宗族因素分析——以山东省 X 村为个案[D].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1:33-34.
- [9]孙秀林. 华南的村治与宗族——一个功能主义的分析路径[J]. 社会学研究,2011(1):133-166.
- [10]周群力. 宗族网络与农村转型发展——信用评级与公共品提供的实证研究[D]. 上海:复旦大学,2013:44-97.
- [11]贾先文. 我国社会转型期农村社区选举中的宗族影响及对策——基于 55 个农村社区的调查研究[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44(2):57-63.
- [12]卢福营. 个私经济发达背景下的能人型村治——以浙江省东阳市白坦一村为例[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37(2):15-20.
- [13]贺雪峰. 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81.
- [14]党国英. 论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兼论中国乡村的民主政治改革[J]. 开放导报,2004(6):23-31.
- [15]孙秀林. 基于村庄民主及其影响因素:一项基于 400 个村庄的实证分析[J]. 社会学研究,2008(6):98.
- [16]欧阳静. 富人治村:机制与绩效研究[J]. 广东社会科学,2011(5):197-202.
- [17]赵晓峰. “富人治村”的乡村关系及其后果研究[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2(8):49-54.

- 对策[J]. 生态学报,2013,33(24):7615-7622.
- [2]涂安国,谢颂华,郑海金,等. 赣江上游小流域农业非点源污染生态防治技术研究[J]. 中国水土保持,2011(9):13-16.
- [3]方少文,赵小敏,莫明浩. 赣南红壤坡面不同措施径流泥沙及氮磷污染输出试验研究[J]. 中国水利,2012(18):10-13.
- [4]陈仲伯,李 万. 湖南省水土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对策研究[J]. 经济地理,2000,20(6):101-105.
- [5]王礼先. 小流域综合治理的概念与原则[J]. 中国水土保持,2006(2):16-17.
- [6]武 艺,王 农,谢颂华. 江西水土保持生态科技园建设现状与发展探索[J]. 中国水土保持,2012(12):65-67.
- [7]李德成,梁 音,赵玉国,等. 南方红壤区水土保持主要治理模式和经验[J]. 中国水土保持,2008(12):54-56.
- [8]穆兴民,王 飞,李 靖,等. 水土保持措施对河川径流影响的评价方法研究进展[J]. 水土保持通报,2004,24(3):73-78.
- [9]杨爱民,王 浩,孟 莉. 水土保持对水资源量与水质的影响研究[J]. 中国水土保持科学,2008,6(1):72-76,92.
- [10]袁东海,王兆骞,陈 欣,等. 红壤小流域不同利用方式氮磷流失特征研究[J]. 生态学报,2003,23(1):188-198.
- [11]孙 昕,李德成,梁 音. 南方红壤区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效益定量评价方法探讨——以江西兴国县为例[J]. 土壤学报,2009,46(3):373-380.
- [12]程冬兵,廖纯艳,张平仓,等. 南方红壤丘陵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技术体系研究[J]. 长江科学院院报,2010,27(11):98-101.